

面对禽流感,紧张情绪为何减少了

相比于十年前,我们的焦虑感少得多了,紧张情绪也少得多了,这不完全取决于疫情本身是否严重,主要是因为和十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应对疫情的环境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金岭

一些媒体在报道禽流感疫情的时候,喜欢顺便提一句十年前的“非典”,想必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对当年的紧张气氛,都会有深刻的记忆。

今天面对禽流感疫情,如果说一点焦虑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相比于十年前,我们的焦虑感少得多了,紧张情绪也少得多了,这不完全取决于疫情本身是否严

重,主要是因为和十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应对疫情的环境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紧张感少了,直接原因一是相比于十年前,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要健全得多,疫病防控技术更加进步,应对疫情的物质条件更加充足;二是经过十年前的“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考验,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比过去多得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经过了“大灾大难的考验,心态自然会从容许多。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今天对待疫情的态度更为科学理性了。今天,

无论是政府的信息发布,还是其他一系列应对措施,态度首先是开放透明的,没有把疫情本身视为有损国家面子

的事情,更不担心及时公开疫情会影响投资旅游等,而是把民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切以民众健康为考量标准。8日上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情况,仅从“联合召开”这一细节看,本身就体现了开放坦诚的态度,和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反过来强化了公众对卫生部

门的信任感。疫情就是疫情,和面子、形象等等没什么关系,这个逻辑里,凸显的是从容、大气和理性。

紧张感少了,还因为今天人们愿意相信,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没有任何人敢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其他不必要的顾虑之下。正因如此,今天大多数人愿意把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作为形成个人判断的可靠信息源,这样的信息环境下,公众就不大可能出现不恰当的反应,从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紧张感。“非典”等公共危机给我们的一大启蒙,就是在面

对疫情的时候,要回归科学的常识,回归社会的常识,回归生命和人性的常识,只有开放透明才能更加有序,在封闭的、信息流动不充分的环境下,只能产生更多的不信任甚至偏激,这反过来又会对信息公开产生过大的压力,使得公开变得更为谨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天一些和疫情有关的说法,有的因为科学性不足,有的因为离题万里,正在干扰着公众的情绪,人为制造着不必要的紧张。比如前几天有关蓝板根的消息,一方面引发了局部的抢购,另一方面引

发了不小的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论断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卫生部门就向公众推荐使用,尽管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再比如,有人在微博上散布一种很离谱的说法,公然说“对于最近风靡的禽流感,国家高层部门一定不要高调!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这种离谱的说法,同样在干扰着公众的情绪。

我们今天要的镇定和理性,既不能靠“偏方”,更不能靠离题万里的戏言,靠的是过去十多年来社会进步的不断积累。

将彭丽媛出访定位为公共外交可行

>>媒体视点

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一同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彭丽媛作为国家主席夫人的表现备受关注,不仅在国内外好评如潮,还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等外媒的“彭丽媛热”,成为媒体抢先报道的焦点。

实际上,“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新时期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彭丽媛出访的效果来看,中央将其确定为公共外交的定位是

恰当的,也是可行的,符合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一般规律。

总结世界各国经验,“第一夫人”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外交角色。

一是首脑公共外交的“左膀右臂”。相对于第一领导人之间的更多涉及国家立场和外交政策的“硬交往”,“第一夫人”们之间强调文化和了解的“软沟通”可以间接影响到她们丈夫之间的关系,为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机遇之窗。

二是政府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相比最高领导人出访强调国家利益,“第一夫人”更强调展现本国的国家形象,

强调向社会各界传递本国人民对受访国人民的友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就是一个国家的“首席形象大使”,是一国国家形象的名片和天然的代言人。

三是社会公共外交的“桥梁纽带”。在很多场合下,“第一夫人”并非完全依附最高领导人,而是独立承担起公共外交的角色。比如代表第一领导人单独出访,出席一些重大的国际文化活动的开幕式和盛会典礼,以及致力于推动社会关注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倡导慈善、环保和人道主义关爱等议题。(摘编自《学习时报》,作者:赵可金 莫映川)

公民论坛

彻查“神探”才能彻底纠错

□王石川

2003年杭州“5·19”奸杀案发生后,以聂海芬为首的杭州警方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了该案“无懈可击”的“铁证”。记者获悉,浙江省政法委已成立调查组,彻查聂海芬等该案侦查、起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人员。(4月8日《东方早报》)

如果说张高平叔侄恢复自由身,获得清白声誉,意味着正义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彻查“神探”聂海芬,问责冤案制造者,则是正义迈出的第二步。如果不彻查聂海芬,

就无法真正慰藉张家叔侄,也体现不出浙江相关部门纠错的决心和行动,更无法彰显正义、以儆效尤。

具体到聂海芬,对其彻查还有别样的意义。聂海芬有“神探”之称,当初办理张高平叔侄冤案时,被称为取得了“无懈可击”的“铁证”,如此高帽实是巨大嘲讽。彻查聂海芬,不能止于张高平叔侄的冤案。2006年,一篇名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文章称,“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近五

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100%……”试问,这350余起“铁案”中,有多少冤案?须从彻查张高平叔侄冤案入手,一并盘查其余的300多起案件。

彻查聂海芬等人,是为了还张高平叔侄一个公道,也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更是引起人们反思,以杜绝刑讯逼供,也遏制再炮制所谓的“无懈可击的铁证”。事实上,新修订的刑法明确强调,刑讯逼供收集口供不能作证据。很显然,如果不杜绝刑讯逼供,不确保证罪从无罪替有罪推定,即便聂海芬倒了,还有张海芬、李海芬……

还有多少“内部消化”的街道办

□王庆峰

湖南耒阳市一个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街道办事处,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4月8日《潇湘晨报》)

小小街道办,养着20多个领导,机构之臃肿,效率之低下,不能不让人反思街道办该扮演何种角色。当地解释说,这是按照

政策撤区并乡之后的遗留问题,20多个领导,不乏老干部因为资历较老想进城,于是“内部消化”安排进街道办。

街道办设立的目的,原本是为“强化居民自治”,但从现实来看,街道办起到的多是“二传手”的作用。一方面,街道和社区功能重合,于是街道将大量工作交给社区,直接导致居委会行政化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次较多,人、财、物资源大都截留在街道办以

上。这种角色设置和职能安排,难怪会产生“遗留问题”的就地解决。

2011年,安徽铜陵就已经全面撤销街道办,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的王金华表示,街道办行政化严重,未实现了解基层民意、化解基层矛盾等功能。类似职能机构最容易成为“内部消化”的改革盲点,还有多少类似“内部消化”的街道办,还有待排查和化解。

信用社“送死亡”是监守自盗

□司马童

河北深州43人因“死亡”被核销贷款,包括当地副市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另有15人“失踪”,58人涉贷款额约250万元,其中多名“死亡”者都健在。知情人称对位高权重者,信用社主任以核销贷款送人情。(4月8日《新京报》)

真可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这起事件中,信用社主任的“送死亡”,居然成了一份满载真金白银的人情大礼。

当然,“神奇”之中也有“不奇”,这便是收获“死亡人情”的贷款者,要么自己身居一官半职,要么与高官小吏沾亲带故。可见,要想“死得值”,也需“凭资格”。

核销贷款的表层解读是“死亡人情”,而再深入剖析一番,它更像是“监守自盗”了。从来就有“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说法,“死亡人情”其实也是一笔“双赢买卖”:既让有权有势的贷款者得到了好处,对于某些金融服务机构来说,

同样可以借此消除“呆账”,美化“业绩”。因此,针对这宗网络爆料,既需关注“慷公家之慨”,更该瞄准“渎必守之职”。

除了河北深州的几家涉事信用社,还有多少“副市长”们的贷款,曾经或仍在静悄悄地“死”呢?这样的“死亡人情”,以及极有可能潜在的“监守自盗”风险,又靠什么来防范和化解呢?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中国平安 PINGAN | 直销车险 4008 000 000 .COM | 专业25年 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平安25年 惠馈天下

(赠送礼品以实物为准)



平安直销车险

4月-5月到期末投保私家车主

来电询价 无需投保 即送车载充电器

投保还有机会 赢取导航仪

*活动有效期: 2013年4月1日至4月30日
青岛、潍坊、临沂、淄博、日照、威海、烟台除外

免费报价: 4008-000-000

平安车险 搜索

全国服务热线: 95511 全国电话报价: 4008-000-000 网络自主报价: 4008 000 000 .com